

高明论著选集

高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季羨林海外基金赞助

高明论著选集

高明著

科学出版社

2001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高明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陆续发表的论文之精选。内容涉及汉字起源和发展方面的理论,商代的图形文字、商代和周代的甲骨文、铜器铭文,战国时代的陶文、盟书以及秦汉时代的简帛文书等,共计28篇。

读者对象主要是古史研究者、古文献研究者、古文字研究者、考古研究者以及文、史、哲等方面的文科在校大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明论著选集 / 高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ISBN 7-03-008370-9

I. 高… II. 高… III. ①汉字:古文字-研究-文集 ②高明-文集
IV. H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382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蕾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1年2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4 插页:1

印数:1—1 300 字数:491 000

定价:7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2001.3.20

考古书店



作者近照

自序

文字是辅助语言的社会交际工具,它可以把当时的语言记录下来传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无论是古代汉字或现代汉字,它的功能,主要是记录语言,表达思维。古代汉字在继承、发扬和传播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事业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它的帮助,脱离文字则一事无成。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学,对古文字学更有特殊的需要。

我从事商周考古工作,研究古文字主要是配合商周考古的研究,探讨的问题皆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所据的资料,除了文献之外,多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特别是带有文字的实物,像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铜器铭文,战国时代的陶文玺印,以及秦汉时期的简帛文书等,都是我所关注的对象。这本选集共收录 28 篇文章,它们是我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陆续发表的论文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早年的作品,也有最近发表的文章。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我在学习当中的一些心得,以及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只是提供参考,很难说都成定论。

有朋友问我,这本选集,文章内容甚为广泛,譬如像汉字的起源,商代的图形文字,甲骨文中的王与帝,臣和小臣,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西周金文中的商业,东周时代的青铜礼器,齐都临淄的制陶业,侯马载书的盟主,秦简日书,武威汉简仪礼,汉代简帛经书今古文,等等。在这些不同内容的研究中,有没有一个贯串全部论著的指导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平素指导我为人、做事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准则,始终遵守一个“诚”字。我的名字即取自《礼记·中庸》中的一句话,“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我以诚做人,以诚待人,不凌弱,不谀强,由此则使我结交了许多诚挚知己的好友,但也因此遭受一些冷遇甚至是打击。我虽以付出换来苦涩,而终不悔,仍将持诚以恒。

选集中之《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一文,是同云南民族学院张纯德同志共同完成的,我们一起研究讨论,最后由我撰写成文。书中所收的文章,均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仅对个别篇章稍作了些修改,一般皆保留了原来的内容。

这本选集能及早刊印,应首先感谢季羨林基金会在经济方面给予的资助。科学出版社闫向东同志为出版此书也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此深表谢意。

1999 年 9 月写于
北京大学中关村

112048/00

目 录

| | |
|-----------------------|---------|
| 自序 | |
|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 | (1) |
| 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 | (18) |
| 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 | (31) |
| “图形文字”即汉字古体说 | (62) |
| 谈汉字中的别体和误字 | (71) |
| 从甲骨文中所见王与帝的实质看商代社会 | (78) |
| 武丁时代“贞 𠄎 卜辞”之再研究 | (84) |
| 论商周时代的臣和小臣 | (94) |
| 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 | (104) |
| 从金文资料谈西周商业 | (117) |
| 西周金文“𠄎”字资料整理和研究 | (127) |
|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 | (137) |
| 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 | (151) |
| 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 | (158) |
| 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 | (180) |
| 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下) | (204) |
| 簋、簠考辨 | (217) |
| 谈古越阁藏吴王夫差剑 | (226) |
| 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 | (229) |
| 商代陶文 | (243) |
| 从临淄陶文看鬻里制陶业 | (253) |
| 说“罍”及其相关问题 | (266) |
| 侯马载书盟主考 | (273) |
|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 | (280) |
|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冠人”俑 | (295) |
| 据武威汉简谈郑注《仪礼》今古文 | (298) |
|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 (313) |
| 老子道德经古注偶识 | (324) |
| 本书引书简称与全称对照表 | (330) |

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

近些年来，在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民和马厂沿、乐都柳湾，以及上海崧泽、马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对于这批资料的看法，最初有人认为：“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1]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汉字起源的最初形态。如郭沫若先生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于省吾先生也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 6000 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 6000 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3]自此之后，关于陶符的研究日益增多，从资料收集、地区考察、年代考订，并有人进行文字考释，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从所发表的文章看，多与郭、于二老的看法相同，有的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如说：“这些符号，正是我国文字的原始形态和原始阶段，它比甲骨文更古得多，是中国文字的源。”^[4]“仰韶刻符和商代甲骨文、金文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金文是仰韶符号的发展。”^[5]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汉字起源于“二元”的论点，一元指仰韶文化陶符，所谓早期指事文字系统；另一元是图画文字系统^[6]。诸如此类的意见很多。本人有些不同看法，在此提出愿和同志们商榷，并希批评指正。

一、陶符与陶文的资料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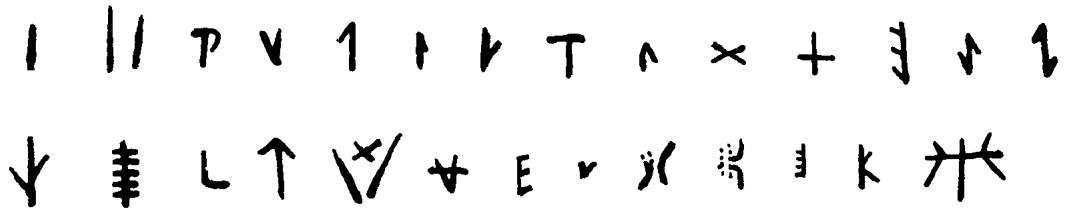
各地出土的陶符资料绝大部分已公布于世。过去郭沫若、裘锡圭^[7]、王志俊、杨建芳、张光裕^[8]等，均将陶符资料作了不同程度的整理和介绍。这里本不必再重复，但是，过去介绍资料，因有人把陶符与陶文视为一脉相承的文字，没有把它们分别开来。如有人说：“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现在把这类材料统以陶文称之，并依其时代的先后综合录列。”^[9]这样势必把陶符与陶文两种不同类的资料混合在一起，所介绍的资料，究竟何者为陶符，何者为陶文，它们有什么区别？时代有什么不同？皆难以分别清楚，不便讨论。所以本文不得不多用一点篇幅，按照不同类属，分开整理。

1. 陶器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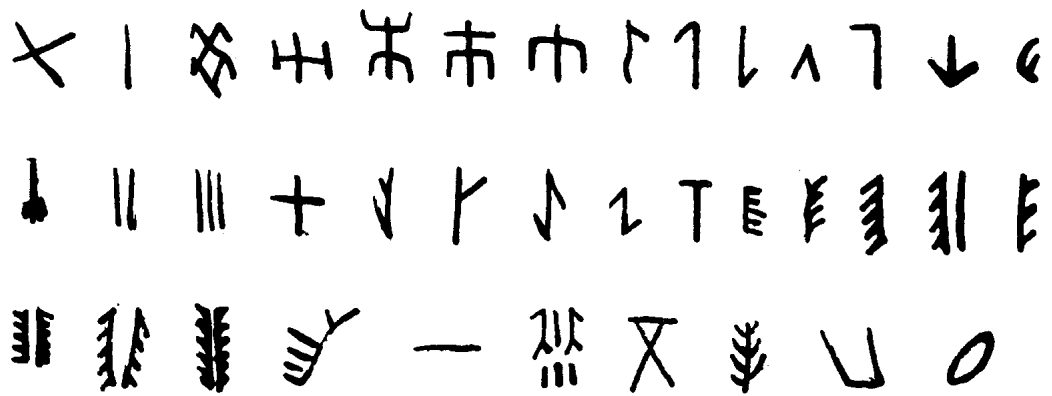
(1)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最早出土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郃阳莘野和铜川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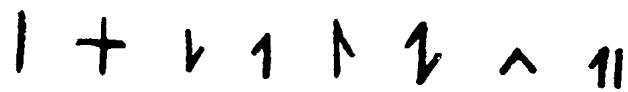
西安半坡陶符



临潼姜寨陶符



铜川李家沟陶符



临潼零口陶符



临潼垣头陶符



长安五楼陶符



郃阳莘野陶符



图一

沟等遗址，其中除半坡、姜寨两地之外，其他均限于采集，所获资料不多。所发现的陶符一般均刻在涂有黑色带纹陶钵的口沿上，但多为碎片，只有少数出于墓中的殉葬品或瓮棺上的陶钵盖，才较完整。从刻划痕迹看，有烧前刻与烧后刻两种，以前者居多。据王志俊同志统计，西安半坡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 133 件，有陶符 27 种；临潼姜寨发现 129 件，有陶符 38 种；铜川李家沟发现 23 件，计 8 种；临潼零口采集 2 件，分 2 种；垣头采集 1 件 1 种；长安五楼 1 件 1 种；郃阳莘野 1 件 1 种。它们的时代，用半坡遗址出土的木炭经¹⁴C测定，最早的标本为公元前 4770 ± 134 年（经达曼树轮校正表校正，下同），最晚的标本为公元前 4191 ± 187 年。又据姜寨炭化木椽测定，为公元前 4677 ± 134 年。其他五地，文化性质和相对年代，均与之相近。这里将这七处遗址出土的陶符，进行排列（图一）。

(2) 崧泽文化陶器符号

1960 与 1961 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进行考古发掘，从出土陶器中发现，在个别器物的肩部，有刻划符号共 4 种（图二）^[10]。它的时代，据出土的人骨经¹⁴C测定，为公元前 3911 ± 213 年与公元前 3233 ± 140 年。

(3) 良渚文化陶器符号

良渚文化是我国江浙地区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1936 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它分布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即在良渚镇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共发现陶符 9 种^[11]。1960 与 1966 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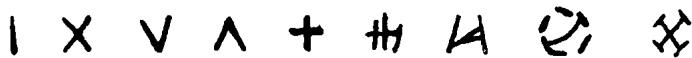
崧泽文化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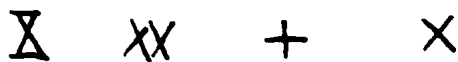
图二

会先后两次在上海马桥镇遗址发掘，该遗址的第 5 文化层属于良渚文化系统，在出土陶片中发现 4 种符号^[12]。据本层出土陶片经热释光测定，为公元前 2600 ~ 前 2150 年。良渚镇遗址虽未经时代测定，但从文化内涵分析，彼此当距不远。这里亦将其出土陶符进行排列（图三）。

良渚镇陶符



马桥镇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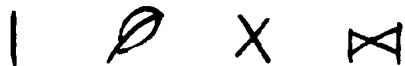
图三

(4) 龙山文化陶器符号

1928 年，首次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层内发掘出三片刻有符号的陶片，

实际只有两种符号^[13]。1964年又于青岛白沙河南岸赵村龙山文化遗址中，采集一片刻有符号的龙山陶片^[14]。此外，又于河北省永年县台口村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刻有符号的陶罐^[15]。河南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曾在龙山灰坑中的陶器上发现符号，

龙山文化陶符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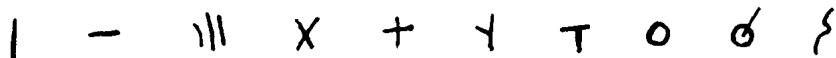
但资料没有公布^[16]。据目前所知，在全国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中，有刻划符号的不多，上述三处遗址总共发现4种符号（图四）。关于龙山文化的年代，因城子崖、赵村、河北永年等遗址都未经过炭

测，只好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测定的数据为参考。据出土木炭经¹⁴C测定为公元前2504 ± 150年、公元前2391 ± 141年。

(5) 马家窑文化陶器符号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洮河流域与青海东部湟水两岸的黄土高原地带。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在甘肃省的和政半山与青海省的民和马厂沿两地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因当时条件所限，彼此关系没有搞清。经过近些年的研究，了解到在马家窑的文化中，至少包含着马家窑、半山与马厂三种不同类型。即在这三种类

甘肃和政半山、青海民和马厂沿陶符



永昌鸳鸯池陶符



青海乐都柳湾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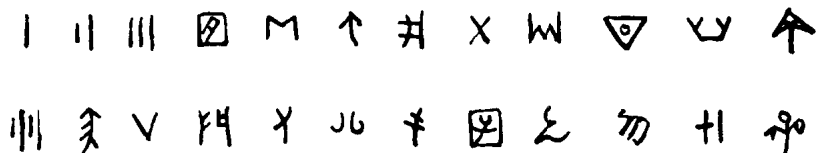


图五

型的墓葬出土的陶壶和陶罐上，发现有用颜料描画的符号，过去曾收集了 10 种^[17]。1973 年 5 月在河西走廊永昌县鸳鸯池遗址，共发掘 151 座墓葬，只在第 69 号墓出土的盘、盅二器底部各刻一个符号^[18]。1974 年 7 月至 1975 年底，在青海乐都柳湾进行考古发掘，此地是马家窑与齐家两种文化的墓区。在马家窑文化中又包含半山和马厂两种类型的遗物，在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一些陶壶腹部或底部，各有一个符号，共发现 50 余种^[19]。它们的时代，据甘肃永靖马家湾村马家窑文化遗址 3 号房子出土的木炭，经¹⁴C 测定为公元前 2623 ± 147 年，又据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 1 号房子炭化木柱，经¹⁴C 测定为公元前 2416 ± 264 年。这里亦将此三遗址出土陶符进行排列（图五）。

上述仰韶、崧泽、良渚、龙山、马家窑等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符，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遗物。它们的特点、形体一般都比较简单，多为横折、竖折或交叉等。进入商代以后，虽然汉字日臻成熟，但陶符仍继续出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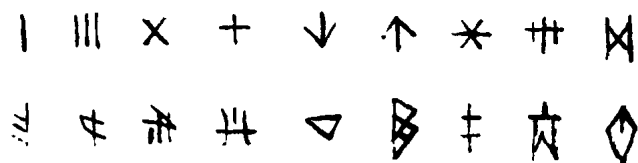
河南偃师二里头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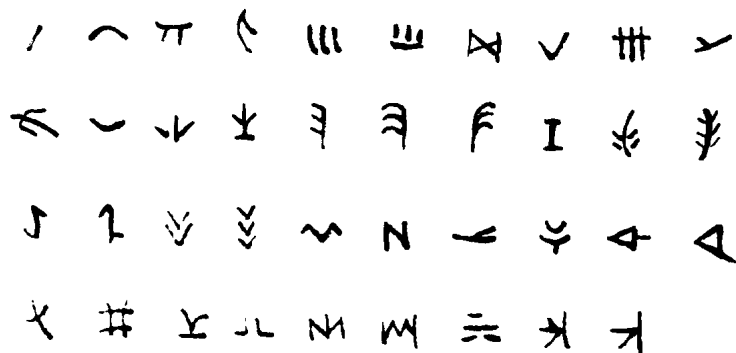
郑州南关外陶符



郑州二里岗陶符



上海马桥陶符



图六

陶片，共发现 24 种符号^[20]；郑州南关外发现 9 种^[21]；二里岗发现 18 种^[22]。这些遗址出土的陶符，绝大部分刻在大口尊的口沿内侧。上海马桥第 4 文化层，内涵遗物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中晚期，在此文化层内出土的陶器，发现 39 种刻划符号^[23]。但是，商代陶器与过去不同，除发现有刻划符号者之外，另有刻写文字的，陶符和陶文同时共存。它们的年代，据二里头遗址出土蚌片经¹⁴C测定，为公元前 1918 ± 114 年。据郑州相当二里岗上层遗址出土木炭经¹⁴C测定，为公元前 1593 ± 140 年。这里将上述商代遗址出土陶符进行排列（图六）。

(6) 春秋战国时代的陶器符号

山东城子崖上层东周谭国遗址，在出土的东周时代的陶片中，亦发现有与上述陶符相类似的刻划符号，过去曾收集了 18 种^[24]。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遗址出土的春秋与战国时代的陶豆盘底和陶鬲颈部，亦发现有同上述相似的刻划符号，而且也是每器一个，共发现 44 种^[25]。这里亦将资料进行排列（图七）。

山东城子崖陶符



山西侯马牛村陶符



图七

陶符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中间经过商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继续出现，不仅始终是每器只用一个符号，而且一直是独立存在，从不和汉字共同使用。例如，即在侯马附近翼城出土的东周陶文“降京”（图八），此二字均见于商代的甲骨文，从它们的形体来看，说明自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字已相当成熟。可是，陶符仍非常原始，形体依然如旧。从而可见，它同汉字并不属于同类事物，有本质的差别。

从各个时代的陶符资料分析，属于仰韶文化的陶符共发现 88 种，不同遗址之间相复出者有 1、1、1、1、1、1、1、+、× 共 8 种，约占总数的 9%。崧泽文化发现 4 种，无复出。良渚文化发现 13 种，不同遗址复出者有 +、× 两种，约占总数的 15%。龙山文化发现 4 种，无复出。马家窑文化发现 62 种，不同遗址复出者，有一、1、十、× 共 4 种，占总数的 6%。商代发现 90 种，不同遗址复出者有 1、III、V、×、十、X、W、卅 共 8 种，约占总数 9%。春秋战国发现 62



图八

种，复出者有++、十、×、11 共 4 种，占 7%。几个不同时代的遗址总共发现 323 种符号，彼此之间相互重复者，除上述者外，尚有一、m、w、卄、I、#、卍、*、▽ 9 种，共计 24 种，约占陶符总数的 7.4%。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各个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符数量不同，各自所用的符号形状也多不同，虽有重复，但数量不多，而且集中在一些笔划简单易于重复的几种符号方面。因而在现有的资料中，看不出在不同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符之间，有什么彼此因袭或相互继承的关系。

2. 陶器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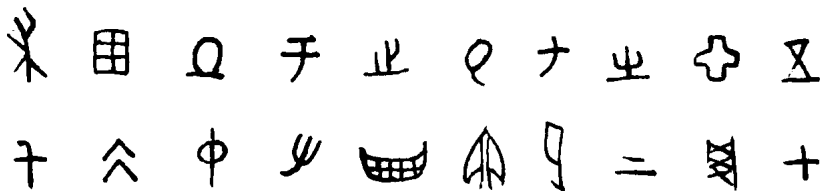
(1) 商代陶器文字

据现有资料证明，自商代以来汉字已日臻成熟，以它那表达汉语的职能为社会服务。如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陶文，有些字形同甲骨文相似，每器不仅 1 字，而是用 5 字、7 字，多至 12 字组成一完整句型。虽然其中有些字不识，句子内容尚不完全被了解，但从字体结构分析，却与汉字同一体系。据发掘者统计，第一次发现有字陶器 38 件，计 66 字^[26]；第二次发现 53 件，62 字。总计共 91 件，128 字^[27]。从全部材料看，并非都是文字，正如唐兰先生对第一次出土资料的鉴定。他说：“吴城遗址商代器物中，在 38 件器物上刻有 66 个文字，很多是刻在陶器底部的，有些可能是纹饰性质的，例如横直三条线和横直两条线，以及 74ET，灰陶钵底刻划的 田 形格等，都不一定是文字。”^[28]它们的时代，据吴城遗址出土木炭经¹⁴C 测定，为公元前 1805 ± 182 年与公元前 1639 ± 13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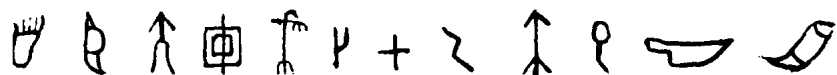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亦发现陶文，台西村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期相当于安阳殷墟一期。在早晚两期的居址中，发现有 77 件陶器刻有文字与符号。季云同志对这批资料撰有专文研究，对一些陶文已作了考释^[29]。

河南安阳殷墟，自 1928 年发掘以来即不断有陶文出土，如小屯、大司空村等地均有发现，已发表的资料约有 80 余件陶器残片，计 50 余字，大部分收在《殷墟器物甲编》内，1964 年金祥恒编《陶文编》亦曾收录。这里将上述三处商代遗址出土的陶文，择其字迹清晰者，选录于下（图九）。

江西吴城陶文



河北藁城陶文



河南安阳陶文



图九

(2) 两周时代陶器文字

西周陶文，如1979年秋陕西扶风邵陈遗址出土一件陶器柄，柄上有烧前刻文7字，作“王为成遣詒口器”，字体与西周金文同。东周陶文资料更多，像陕西咸阳、临潼，山西侯马，山东临淄、邹县，河南郑州，河北易县等地都有发现，分刻写与印模捺印两种，因为这方面资料很普遍，故不再举例。

通过以上介绍，说明陶符与陶文是两种不同的事物：陶符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期间，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从现有资料看，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陶符，各有特点，彼此重复的数量很少，只限于笔划简单的几种，这种重复并非由于继承或传播所至，纯属偶然。陶器上刻写的文字，据现有资料看，初见于商代中晚期，经过两周和秦汉等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一直使用到今天。我们相信今后一定会发现更为原始的陶文。但是陶符与陶文不同，它们各自产生的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彼此的功用也不同，根本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

二、陶符不是汉字 更非一脉相承

从上节讨论中看出，陶符与陶文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纵然文字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符号，但它含有词义和读音，与一般符号有本质的差别。陶符只能起到一种标记的作

用，不能代替文字，陶文才是真正的汉字，二者之间既非一脉相承，也无因袭关系，根本是两回事情。我们这一看法，无论从理论或实物资料的使用都有充分的证据，下面仅从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1. 文字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诞生，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内部不能产生文字

文字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文字必须同语言密切结合，才能成为人们交际的辅助工具。语言有自身的局限性，受一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话讲出口，语意随着语音而消失。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留痕迹的语言，不能满足人们在社会交际上的需要，要求把语言保存下来传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这就是在社会生产的产品有了剩余，贸易往来非常频繁，需要把经营双方的协议，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当然，有了对文字的要求，不一定就能产生出文字，中间经过各种形式的尝试，最后才创造出文字。此一历史阶段，即恩格斯所讲：“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30]具体对汉字来讲，比铁的发生要早，在中国真正用文字记录文献，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但是，从恩格斯这段话中可以了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标志着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从理论上分析，文字必须产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首先是产品有了剩余，产生了商业，出现了阶级，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文字。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主要的生产工具还是石器和蚌器，部落之间仍保持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剩余产品不多，氏族内部尚无明显的贫富分化。最近巩启明与严文明两同志根据姜寨遗址的村落布局及住房分类等资料，对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作了比较贴切的说明。首先介绍了姜寨遗址的堆积，先后有五个文化时期：相当于半坡早期，史家、半坡中期，半坡晚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31]。第一期的村落遗址最引人注目，它包括居住区、房屋、窖穴、窑场、围沟、广场、道路、墓地等重要遗迹，构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原始村落。他们从住房的分类与分组中了解，姜寨一期同时居住五个氏族，同属一个胞族。多数适龄男女实行族外婚，普遍存在着对偶家庭。关于财产所有与产品分配，至少家畜饲养和制陶是由氏族掌握，产品的最初分配权大概也在氏族，各家族分到后储藏起来，再定期分给各个对偶家族享用。他们说：“无论从墓葬的规模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优劣来看，差别都是不显著的，正同房屋建筑一样，在这里看不出贫富分化的迹象，表明当时姜寨人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32]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描绘出大概的轮廓，对我们很有帮助。不难设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文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论《人类的进步率》一节，即把文字的使用列为古代文明时期的主要贡献。他虽然讲开化时期发明了字母，可是他说当时已出现了“铜矛头”、“铁刀剑”，同时“城镇都市生活已进一步形成”。这同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会毫无共同之处，反而进一步证明，汉字的产生和应用时期，在我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可能在夏代前后。

2. 文字与语言结合并表达语言，陶符不能表达语言

汉字是为适应汉语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古代汉语任何一种词类，皆以单音节居绝对多数，一个完整的词，就是一个音节；汉字也基本保持一词一形一个音节。字义本于汉语中的词，字音来源于本词的语音，字形即描绘本词代表物的形体。例如：马、牛、羊、犬、豕，五种牲畜的名称，古汉字都是采用按物绘形的独体象形字（图一〇）。



图一〇

从此五字形体来看，都是按照实物身躯描绘的图形，音读显然就是该物的名称，这就是古人将独体象形字称为“名”的道理。字义当然是指本词所表达的实物。唐兰先生曾讲：“文字不同于图画，也不同于记号，记号是代表某种思想或帮助记忆的，但它们都没有跟语言结合，所以不是文字。文字是社会的产物，它是某一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尽管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却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文字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33]

陶符则与文字不同，它是当时陶工为了某种用途临时做的记号，无语言的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因而既无词义，亦无读音，只是一种记号。就以仰韶文化的 88 个陶器符号来讲，没有谁能十分准确地说明某一陶符所代表的词义及读出它的本音。因此这种符号只能是在一个制陶作坊或家族小范围内使用，并无广泛的社会意义。类似这种在陶器上刻划符号的习俗，不仅出现在远古，近代一些后进民族也还使用。汪宁生同志根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的资料来说明这种陶符的用途和原义，最有说服力。他说：“西双版纳傣族制陶，据我们 1964 年和 1965 年两次调查所见，一般是不加标记的，但遇到下列情况，偶亦作出标记：①做好器坯后有时为了提醒自己这是刚做好的，便在底部随便划几道，以免和已干的坯相混。②做坯时中途有事离开，便用手指甲在器坯壁上划一直道，表示拍打到这里，下次接着再打。这一划在下次拍打中往往被消灭，但亦有留下痕迹的。③若几家合烧一窑，常在自己器物底部作出符号，以免彼此相混。这些符号一般是用指甲划出交叉形，也有划一直道或几道平行线条，并没有什么含义，只要认出自己的产品即可。而且同一个人这一次做的符号和下一次做的符号也未必相同。总之，这是一种随意刻划，只是为了不与他人相混即可。”^[34] 这可能就是上述陶符用途中的几例，实际用途恐不限于此，也可能包括当时宗教信仰和其他某

些标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符，可能是所有权的标记。据《西安半坡》的作者说：“我们推测，这些符号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这个所有者，可能是氏族、家族或个人。这一假设的证据是，我们发现多种同类符号。出在同一窑穴或同一地区。例如，以数目最多的第一类符号的出土情况分析，在我们统计的72件标本中，大部分出土6个地点，基本上是相连接的一个地区，面积也不过100多平方米。又如在H341中发现同类的标本两个。在有5个Z形的符号都集中出于两个探方内。”^[35]

3. 文字随着语言不断发展，陶符孤立存在停滞不前

语言的本性最活跃，各种词类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文字是表达语言的，为了适应语言的要求也必日益改善。就汉字来讲，自诞生以来迄至现在，从未间断地在发展变化。如字体结构，主要有象形、会意和形声三种，这三种字体并非同时出现，乃是逐渐产生的。最初产生的是象形字，它是仿照原始图画的形式，如以上所讲，按照物的实体绘出相应的图形，即可成字。不过这只是表达物的名称，即所谓“名词”词汇。但只有名词并不能构成一句完整的语言，其中必须有动词和其他词类。早期创造动词，采用复体会意的方法，用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成一象征性的动态。像用手拿禾则为“𥝌”（秉），用手握贝则为“𣎵”（得），用足登山则为“陟”（陟），用足渡河则为“涉”（涉），等等，皆为商代甲骨文常见的动词。唯有表达动词的文字出现之后，汉字才基本具备表达汉语的功能。

社会上的事物，永无休止地发展。事物、概念、语言、文字四者递相滋生的规律，永远是事物首先出现，然后在人的思维中产生对此一事物的概念，再后形成表达此概念的语言，最后才会创造出代表此一语言的文字。文字永远出现在语言之后，落后于语言。尤其在古代，当时仅用象形和会意两种方法造字，不仅落后于语言，甚至有些语言无法制造相应的汉字来表达。只有语言形态，没有书面形态。在缺字愈来愈多的情况下，不得不暂借同音字的办法，以音代字。后来出现在同音假借字的基础上增添相应的形旁，组成一种既表音又表义的新体字，这就是形声字开始诞生。形声字采用两个现成的字分别充当形旁和声旁，不必另造象形或会意的新字体，这就克服了过去有的词汇无法造字的困难。自此之后，汉字完全进入成熟阶段，凡是汉语出现新词，用形声方法造字，即可应运而生，完全能满足汉语发展中的一切要求。因而才使汉字保持到今天，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字。再就汉字形体来讲，据目前所知，自商代甲骨文之后，经过两周金文，战国古文，秦朝小篆，汉魏隶书，乃至今日通行的楷书，中间经过若干的发展和变化，从不规范、不定形，逐渐走向规范、定形。汉字的数量也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词汇的丰富而字数逐渐增多。商代的甲骨文约4500余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秦篆9353字，当时已二倍于商；如今汉字已超过5万，又十倍于古。